

# 葉榮鐘的「述史」之志： 晚年書寫活動試論\*

若林正丈\*\*

## 摘 要

本文嘗試刻畫臺灣抗日知識分子葉榮鐘的後殖民身影。葉榮鐘在戰前是抗日民族運動右派陣營的知識分子；戰後，在戒嚴令仍長期實施中的 1960 年代後半期以降，發表了《臺灣民族運動史》等一連串的著作，以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當事者的身分，將其經驗與記憶傳述後世。這是臺灣現代史中對葉榮鐘理解的原型。從抗日知識分子到傳遞過往歷史經驗的書寫者，這樣的形象是在何種歷史背景與人生歷程中積累而成？為了回答此一問題，筆者將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放在歷史脈絡中去檢討。從研究結果可見，非戰後世代的葉榮鐘因《臺灣民族運動史》受到海內外及戰後世代的注目，並現身於 1970 年代「回歸現實」的思潮中。而《臺灣民族運動史》的撰寫背景，雖起因於蔡培火、吳三連等人為了反駁楊肇嘉回憶錄的記述，延請曾是抗日運動右派的「文膽」葉榮鐘來執筆寫作，但更重要的是，葉榮鐘本人的「述史」之志。戰後，《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的編纂，可以視為其堅定「述史」之志的契機。葉榮鐘作為「文膽」的角色，和「述史」的經營可謂是重疊的。葉榮鐘的述史之志，在留下紀錄的同時，更向廣大的臺灣社會全體發話，要求承認臺灣人歷史與文化之對等，其傳遞的精神，也同為康寧祥、黃煌雄等戰後世代繼承。此外，為了紀念逝世的抗日運動前輩，撰寫相關文章以公諸於世、傳承記憶的這種做法，更被繼承在黨外雜誌之中，這也是葉榮鐘在 1980 年代後半

---

\* 本論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戰後臺灣社會與經濟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年 12 月 23-24 日）。筆者感謝評論人陳芳明教授、與會學者，以及吳玲青女士（時為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協助翻譯。筆者以吳女士的中譯為底本，參考成功大學吳密察教授與顏杏如博士之意見修改而成。本文投稿後按照兩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意見又做了些修改，在此一併感謝。附記：在本文寫作過程中，資料收集、口述訪問、回覆詢問、調查旅行的支援等等，受到許多友人的幫忙。以下列記友人姓名，以誌謝意（不依順序、敬稱省略）：葉芸芸、葉光南、施織織、陳培豐、柳書琴、吳密察、林瑞明、康寧祥、陳清喜、葉國興、方昇茂、張耀錡、洪銘水。

\*\*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

來稿日期：2010 年 6 月 29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9 月 13 日。

期臺灣史研究興盛之前，留下的遺產之一。藉由釐清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我們捕捉到其進行後殖民主義文化活動的身影，也看到與日本殖民統治對抗的臺灣人歷史經驗，在戰後國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環境中，被論述、成為社會記憶一部分的過程。

關鍵詞：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述史」之志、康寧祥

- 一、前言
  - 二、「述史」之志
  - 三、書寫活動的重新展開與「自傳」
  - 四、「臺灣先賢印象記」
  - 五、「臺灣政治運動史」
  - 六、「日記」與「國民黨統治下二十五年史」
  - 七、葉榮鐘與青年們：歷史記憶的傳承
  - 八、代結論
- 

## 一、前言

葉榮鐘（1900-1978），臺灣彰化鹿港出身。兒時玩伴洪炎秋（1899-1980）在葉榮鐘辭世之後，應其內弟施維堯之請，為他撰寫如下的墓誌銘：

葉先生榮鐘字少奇，日據時期畢業東京中央大學，即加入林獻堂翁的民族運動，因中日文都好，曾主持臺灣民報等報筆政，任東京支局長。光復後，任職省立臺中圖書館指導輔導部等部長；後轉彰化銀行，歷任科長、主任、協理、顧問等職。退休後，從事寫作，出有《臺灣民族運動史》等書。新近罹癌逝世，時在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年七十九歲。老友洪炎秋為作銘說：少壯抗日，老寫文章，忽罹絕症，竟爾身亡，戚友聞耗，莫不悲傷。豹死皮留，人死名彰，民運一史，可垂無疆。<sup>1</sup>

這裏顯示了關於葉榮鐘生涯的簡潔記述，以及同時代友人給予他的評價，可謂訴說出臺灣現代史中葉榮鐘被人所理解的原型。在這個理解中，葉榮鐘這樣的人物，戰前，是臺灣殖民地時期林獻堂派抗日民族運動——即林獻堂（1881-1956）

---

<sup>1</sup> 洪炎秋，〈悼念葉榮鐘先生〉，《臺灣文藝》62（1979年3月），頁240。

所率領、同時也是資助者的抗日民族運動右派陣營之知識分子；戰後，在戒嚴令仍長期實施中的 1960 年代後半以降，發表了《臺灣民族運動史》等一連串的著作，以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當事者的身分，將其經驗與記憶傳述至戰後，也因此留名後世。

筆者重新提起葉榮鐘，當然不是想對上述已經成為定論的理解提出異議，而是想將其晚年的書寫活動放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再作檢討。透過這樣的檢討，想要觀察過往的日本殖民統治以及與之對抗的臺灣人歷史經驗，在戰後國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環境中，如何被論述、成為社會記憶一部分的過程。

事實上，葉榮鐘在這個過程中的形象，在社會學者蕭阿勤對 1970 年代「回歸現實」思潮，所周密進行的知識社會學之論述時曾作過點描。這個時期，戰後世代的知識分子及黨外民主運動人士，開始重新注目並審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經驗，也就是以《大學雜誌》的陳少廷（1932 年生）為先驅，<sup>2</sup> 接著由康寧祥（1938 年生）藉《臺灣政論》等展開推動，之後延續至彰顯蔣渭水的黃煌雄的言論，在這一連串的動向中，葉榮鐘成為傳遞過往歷史經驗的書寫者<sup>3</sup> 而登場。<sup>4</sup>

本稿受到蕭阿勤所描繪此一葉榮鐘形象的啟發，試圖重新審視 1970 年代思潮當中，葉榮鐘登場的過程。<sup>5</sup> 將視點移到曾為抗日知識分子的葉榮鐘身上，討論他是在怎樣的歷程中，進一步地說，就是葉榮鐘在戰後經過了什麼樣的人生而走到如此的形象？這是本文的問題。

<sup>2</sup> 陳少廷，〈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知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大學雜誌》43（1971 年 7 月），頁 4-8。本文是題為「七七事變與抗日運動」專輯中的第一篇論文。其參考文獻列出了葉榮鐘編著的《林獻堂先生年譜》和刊載於《自立晚報》的〈日據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sup>3</sup> 刊載於《臺灣政論》的三篇為：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臺灣政論》1（1975 年 8 月），頁 52-54；凡夫為筆名發表的〈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3（1975 年 10 月），頁 66-69；凡夫，〈革命家蔣渭水〉，《臺灣政論》5（1975 年 12 月），頁 76-79。

<sup>4</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頁 285-288。

<sup>5</sup> 關於同時期的葉榮鐘，臺灣文學研究學者廖振富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值得參考，但他的焦點在做為散文家以及古典詩詩人的葉榮鐘。參見廖振富，〈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國文學誌》8（2004 年 6 月），頁 35-76；廖振富，〈論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之研究價值〉，《臺灣文學學報》9（2006 年 12 月），頁 13-43；廖振富，〈論葉榮鐘六〇年代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苦悶與蛻變：六〇、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頁 611-664。

這也是刻畫臺灣抗日知識分子後殖民身影的嘗試之一。若以相當理想的形態來描述筆者想要嘗試的葉榮鐘研究，則包含具體釐清葉榮鐘晚年在戰後書寫活動的內涵與外延之雙面向。所謂的「內涵」，指葉榮鐘著述內容本身，以及與其著述活動直接相關的社會環境（家族、友人、媒體關係者等）和葉榮鐘的相互作用。「外延」則是指他的著述活動所新孕育出的人和思想的聯結、波紋（閱讀著述後前來拜訪的年輕人和編輯、新發表場域的出現，以及這些人的後續動向等等）。

1966年，葉榮鐘從長年服務的彰化商業銀行（1948年入行）退休。1960年代初重新開始他戰後的書寫，活動漸趨高峰是其退休後約當其晚年的十數年。這個時期，對於葉榮鐘和妻子施織織（1931年結婚）而言，正是孩子們留學、就業、結婚成家的時期，也是為人父母扶持兒女自立的最後階段。這段期間，他也遭逢嫁給住在日本舊友之子的長女蓁蓁（1932-1967年）去世的不幸。在長期的戒嚴令體制尚無解禁徵兆的時代中，一個退休的銀行員，亦為人父祖的昔日抗日知識分子，如何將其經驗向社會發話？他所發話、記述、傳達的過去經驗與記憶，又如何與下一個時代連結？本文將試以上述方法盡可能地探問這幾個問題。

但是，由於筆者的史料與資料收集、解讀工作始剛起步，現在這個階段所能敘述的部分極為有限。例如，後殖民時期進行文化活動的抗日知識分子，不用說當然不限於葉榮鐘一人，但是筆者現在能夠掌握的並不多。<sup>6</sup> 因此，作為上述研究企圖的第一步，本稿根據葉榮鐘次女葉芸芸（1945-）、長男葉光南（1938-）等人整理的葉榮鐘日記與書信，追索其隨筆集《半壁書齋隨筆集》、《臺灣民族運動史》，以及收於《臺灣人物群像》等數篇文章，是如何執筆完成的。

## 二、「述史」之志

從葉榮鐘留下來的日記和家書等，可以看到他對歷史著述意志的幾個記述。用葉榮鐘自己的說法加以分類，他所試圖寫作的，包括：(1)「臺灣政治運動史」或「臺灣民族運動史」、(2)「回憶錄」或「自傳」、(3)「臺灣先賢印象記」或「臺

<sup>6</sup> 舉例來說，就算只是檢討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將王詩琅和其周邊納入視野也是不可欠缺的，但在現時點仍然無法充分進行。

灣先賢群像」，(4)「國民黨統治下二十五年史」以及「日記」，此外尚有(5)「日本統治下之臺灣」。<sup>7</sup> 這些或可總稱為(葉榮鐘的)「述史」之志。<sup>8</sup> 由於這些都是與他自身相關的臺灣同時代史，因此葉榮鐘的「述史」之志，可以說是記述與傳達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抗日知識分子歷史經驗的意志。

編輯《葉榮鐘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的葉芸芸指出，葉的書寫活動有過兩次高峰。一是在1930年代，1930年春天畢業於東京中央大學的同時，被林獻堂召回，一方面擔任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書記長，一方面加入文學雜誌《南音》，揮舞健筆致力評論，隨後進入臺灣新民報社、擔任社論的寫作。這個時期的葉榮鐘，在臺灣近代文學史研究中經常被提及。第二個高峰則是前述1960年代以後到晚年的時期。<sup>9</sup>

葉榮鐘最初記下其「述史」之志，是在第一個高峰即將結束之際。葉在1938年8月6日的日記中，以日語寫下以下的文句：

非完成終生事業《臺灣政治運動史》不可。這不是現在才決心如此，然而到目前只有焦慮而沒有準備，感到非常慚愧。<sup>10</sup>

這一天的早晨，在臺北市內的喫茶店與楊雲萍(1906-2000)碰面。當時，楊雲萍於1933年自日本留學歸來，雖然尚未找到固定的工作，但是已經以《先

<sup>7</sup> 其他還顯示了寫作《臺灣民族運動史年表》的意志(見〈附錄一、1972年1月18日寄林莊生書信〉，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葉榮鐘全集〔以下簡稱「全集」〕6：葉榮鐘日記》[臺中：晨星出版社，2002]，下冊，頁1205)；《林獻堂傳》(1972年2月4日日記，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717)。後者並未動筆，前者實際著手，在執筆《臺灣民族運動史》之際完成臺灣的部分，之後追加「中國(大陸)」、「日本」、「國際」的部分。但是生前未能出版，去世後才以《全集3：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刊行。

<sup>8</sup> 葉榮鐘從18歲開始作詩，之後的60年間留下了600多首的舊體詩。這些詩作首先由莊幼岳校訂，1979年集結於《少奇吟草》，分發給親族、友人，之後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5：少奇吟草》(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時，因1979年當時的政治理由而無法收錄的1961年之作〈哀哀美麗島〉、1978年作的〈無題〉都得以收錄。從無中斷、持續創作的這些詩作，不只是重要的傳記資料而已，也可以說是「一頁詩史」(洪銘水，〈《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5：少奇吟草》，頁44)。因此，在筆者檢討葉榮鐘「述史」的研究中也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限於筆者的能力無法系統性地檢討，只能部分地言及這些詩作，非常遺憾，不得不在此先加說明。

<sup>9</sup> 葉芸芸，〈編輯報告〉，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上冊，頁14-15。

<sup>10</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133。

發部隊》、《臺灣新民報》等為舞臺展開了書寫活動。<sup>11</sup> 葉榮鐘感覺到楊雲萍「舉止愈發展現大學者的氣度」，內心湧現對自己不夠努力的羞愧感，而在心裡立了種種計畫，其中之一就是寫在日記中的「臺灣政治運動史」。

其時，葉榮鐘於 1935 年年底正式進入臺灣新民報社，擔任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每週一次擔綱日文社論的寫作。從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的閱歷，以及當時的職業、社會地位看來，這是符合其執筆「臺灣政治運動史」的意志。再者，隨著當時 1931 年臺灣共產黨被彈壓，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等左派抗日運動也遇毀滅；1934 年 9 月，自 1921 年起持續進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迫中止；1937 年 7 月，葉榮鐘自身擔任書記長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被迫解散。就消極的意義而言，時期上也並非不適合。

閱讀此際前後時期的日記，可以得知葉榮鐘開始閱讀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及《中國歷史研究法》、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稻葉岩吉《支那近世史講話》、摩爾根（Louis Henry Morgan）《古代社會》、多桑（Abraham C.M. d'Ohsson）《蒙古史》、伯倫漢（Ernst Bernheim）《歷史學とは何ぞや》（*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何謂歷史學》）等歷史書籍。如果執筆「臺灣政治運動史」為其「終生事業」的話，閱讀這些書籍或許是其準備、助跑的一環。但是，葉榮鐘並沒能開始寫作。這又是何以如此？

上述的引用中也能看到的，這個時期的日記，時常可見他言及對於自己的學業中途而廢感到遺憾。<sup>12</sup> 1927 年夏天開始的第二次留學生活中，葉榮鐘遇見了他仰之為師的人物矢內原忠雄（1893-1961）。葉榮鐘遵循林獻堂的指示，在 1930 年春天畢業後旋即回到臺灣，這就他與林之間亦師亦父的仰慕關係而言，於情於

<sup>11</sup> 林春蘭所編《楊雲萍年表》說楊雲萍於 1932 年自日本留學歸來（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2〕，頁 219-221），但根據許雪姬之考證，他歸來的時間應為 1933 年。參見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 1（2006 年 3 月），頁 122-123。

<sup>12</sup> 例如 1939 年 2 月 9 日的日記有以下的述懷：「讀河合〔河合榮次郎〕氏編的《學生と讀書》。從諸家的讀書經驗談，我並沒得到所期待的成果。但對他們每人在中學、高校時代看了很多書一事卻感到羨慕……對過去不用功感到很傷心……」（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頁 163。）再者，戰後寄給至交好友莊垂勝的長男林莊生的書信（1968 年 4 月 27 日）中，自述從年輕時起無法自主安排生活，而且由於職業（新聞記者等）的關係，知識偏向雜學，「到了這個年頭，沒有一樣真正屬於自己的專門的學問」。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 241。

理皆屬當然，但就葉榮鐘而言，或許在心中也不無蘊含一種無可奈何之感。<sup>13</sup> 因此葉榮鐘自身對於學業這樣的「半途而廢」，在他內心某處或許被當作不能寫作的理由也說不定。然而，最終還是跨越時間完成了「述史」之志，因此，與其說當時這種顧慮成為決定性的障礙，不如說外部嚴苛的政治環境，使他克服顧慮、致力「述史」之事沒有辦法成為現實可能的課題。

進入臺灣新民報社後，雖然葉榮鐘本身的社會地位可謂上昇且安定了，但是圍繞著臺灣新民報社的狀況卻走向惡化一途。葉進入臺灣新民報社的翌（1936）年6月，林獻堂因為「祖國事件」受辱而避難東京，臺灣新民報社也成為軍方的眼中釘，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漢文欄被迫廢止，報社由於經營不善雪上加霜般地迫使社員減薪二成。在此之後，葉榮鐘的生活受到戰爭及其陰影的強烈擺佈。1939年以臺灣新民報社東京支局長的身分赴任，但在糧食供給惡化的情況中，妻子健康受損而舉家返臺。1941年就任臺中支局長，但是《臺灣新民報》受到當局的壓力，報紙名稱不得不改為符合時局的《興南新聞》。1943年隻身前往馬尼拉擔任《馬尼拉華僑日報》編輯次長，然而這是被日軍以《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身分徵用前往的。任期結束總算得以安然返臺時，《興南新聞》已經被其他報紙合併成為《臺灣新報》，葉擔任其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不過，1943年10月開始，聯合國軍隊的空襲漸趨激烈，不得已於1945年4月辭去《臺灣新報》職務，舉家疏散遷至臺中州鄉下，迎向日本的戰敗。<sup>14</sup> 不論是赴任東京、或者前往馬尼拉、遭遇空襲等，若運氣不佳，葉榮鐘自己或其家人便極可能遭遇危險。這樣的時代當然不是「述史」的時候。甚至，之後的日本戰敗、脫離殖民地統治、

<sup>13</sup> 根據與葉榮鐘一起到矢內原忠雄自宅參加聖書講授的陳茂源（1903-1996）的證言。那是1929年的秋天：「那時（在東京小石川楊肇嘉宅的新民會周日懇談會的中途，聽到葉榮鐘離席說要去矢內原家參加聖書講授），我自己忽然從甚麼清醒似地，反射性的請求他也帶我一起去。那天晚上的大森八景坂上、矢內原家的景象終生難忘。我有如身在夢境，目擊了在孤燈下只對著一位異鄉青年講授「路加傳」的先生的認真身影。我的直覺有如感到，終於碰到了一直到現在都在暗中摸索的東西……。這一晚的講授結束之後，我取得了矢內原先生的同意，以後我也能夠參加，雖然因為職務（1932年起在松本擔任法官）的關係有時可能缺席。葉氏在那之後不久，也不得不返回臺灣，在銀座的資生堂舉行了只有兩個人餞別。（葉氏）一面歡喜著終於得到打從心底尊敬的良師，從此要真正錘煉自己：一面訴苦著因為自己無父母兄弟、天涯孤獨，此時身不由己地回臺。他那種情景，彷彿如同昨日」參見陳茂源，〈大森の家庭集會の頃〉，收於南原繁等編，《矢內原忠雄：信仰・學問・生涯》（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110-111。

<sup>14</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臺中：晨星出版社，2002），頁46-52。



「回歸祖國」，這樣臺灣歷史的大轉變，也未能立刻提供「述史」的環境。

隨著日本戰敗的消息傳來，林獻堂再度展開公眾活動，同時，葉榮鐘做為林的幕僚，也開始忙碌周圍的事物。葉擔任「國民政府歡迎準備委員會」的總幹事，擔綱臺中市第一回臺灣光復節慶祝大會的司儀；在「臺灣省海外僑胞」的救援上，和林獻堂一起向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等陳情。1946年8月，加入林獻堂等人的「臺灣光復致敬團」，也訪問了南京、西安等地。這些活動中所用的文書，大多都是出自葉榮鐘之手。可以說，林獻堂的活動再度展開的同時，葉榮鐘所扮演的原抗日右派「文膽」（文書幕僚）的角色也再度復活。此外，當好友莊垂勝（字遂性，1897-1962）被派任為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館長時，葉榮鐘也擔任該館編譯組長兼研究輔導部長，與莊一同主辦各種文化講座、組織臺中知識分子的「談話會」等，盡力促進臺中地區文化活動的活化。<sup>15</sup>

二·二八事件之時，莊垂勝被推舉為「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遵循臺北的作法，在處委會下設置了幾個下級部門，葉榮鐘成為其宣傳部長。但是，隨蔣介石派遣的鎮壓軍即將抵達的消息四起，3月11日晚上，莊垂勝等數名委員會集，決定解散處委會。葉榮鐘以及率領「二七部隊」的謝雪紅（1901-1970）也都參加了這個會議。「二七部隊」在12日午後，為了避免臺中因巷戰造成市民犧牲，決定撤退至埔里。<sup>16</sup> 當時9歲的長男葉光南，長大之後被父親的舊識告知，12日晚上聽到父親廣播的聲音，那是宣布「二七部隊」撤退至埔里、國軍部隊不久將進駐臺中市內，呼籲市民沉著應對絕不外出的廣播。<sup>17</sup>

事件之後，莊垂勝為憲兵隊逮捕，奇蹟似地在一週之後被釋放。葉榮鐘雖然未被逮捕，但是和莊一起被免去了圖書館職務。當時臺中師範學校校長、前述的洪炎秋也因為與事件有關而被免職。莊垂勝的長男林莊生（1930年生，1961年以後移居加拿大）認為莊被釋放的背景之一是林獻堂向軍隊當局陳情。<sup>18</sup> 雖然沒有具體足資判斷的資料，但官憲之手沒有伸向葉榮鐘，或許也是林獻堂的政治保護傘以某種形式發揮了作用。不過，根據葉芸芸的回憶，事件發生之後，友人好

<sup>15</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頁52-54。

<sup>16</sup>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編著，《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編者，1992），頁93-94。

<sup>17</sup>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臺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354。

<sup>18</sup>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頁64-65。

幾次勸說到鄉下避難，但是葉榮鐘都不肯。<sup>19</sup>

沒有工作的葉榮鐘，翌年在林獻堂的斡旋下，進入彰化商業銀行。<sup>20</sup> 在此前後，葉雖然被國民政府推薦為臺灣省參議會議員，但是辭不肯受（1947年12月），由青年黨和民社黨聯合推為監察委員候選人（1948年5月），也未接受。<sup>21</sup>

之後，如同眾所周知的，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內戰情勢不利，實施戒嚴令等臺灣的治安體制日益強化。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迫使大多數的臺灣知識分子保持沉默，葉榮鐘也不例外。如同下面引用的述懷，甚至連日記都沒寫。此際不是「述史」的時候。

### 三、書寫活動的重新展開與「自傳」

那麼，葉榮鐘的沉默如何被打破，「述史」之志是如何實現的？首先，表一是顯示到目前為止、以專書出版的葉榮鐘著作一覽。

根據葉芸芸的說法，葉榮鐘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恢復書寫活動的關鍵，是為了紀念1956年客死於東京的林獻堂而編著《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一事。<sup>22</sup> 葉榮鐘在這個紀念集中，寫作長篇的〈林獻堂先生年譜〉，同時，也寫了〈杖履追隨四十年〉。之後不久開始寫隨筆，「批判社會陋習、記錄民俗文化之類的隨筆，在死去之前從無間斷地寫作，留下了45萬字的隨筆」。<sup>23</sup> 如同表一所記，當初大部分文章都發表在一般人很少看得到的、也就是他工作單位刊行的《彰銀資料》（月刊）（最早的文章是1962年7月）。1965年3月，集結這些文章，由與莊垂勝有

<sup>19</sup>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頁354。

<sup>20</sup> 1905年彰化銀行設立，1947年改組為彰化商業銀行，林獻堂是第一任董事長。林獻堂「亡命」東京之後，次男林猶龍（1902-1955年）隨後承繼，但卻比父親林獻堂早去世，由羅萬偉（1898-1963年）承繼，羅在東京出席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時，因腦中風病倒、客死東京。直到羅萬偉任董事長為止時，葉榮鐘被重用於人事部，但是張聘三擔任後任董事長時，就不再如此（2009年8月4日葉光南直接告訴筆者的話，並見葉榮鐘日記的關連記述）。

<sup>21</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頁56-57。

<sup>22</sup> 在這之前，《臺灣文獻》1953年6月號中以「凡夫」的筆名，例外地寫了〈記辜耀翁〉一文。後收錄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2：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頁333-338。

<sup>23</sup> 葉芸芸，〈編輯報告〉，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冊，頁13。

表一、葉榮鐘著作專書一覽

出版年月	書名	出版商	全集編號	備註：初刊雜誌、新聞等
1965年3月	《半路出家集》 (半壁書齋隨筆第一輯)	臺中：中央書局	4上	所收隨筆在文末只記初刊年月。據全集編者葉芸芸所言，幾乎刊載於《彰銀資料》(只有〈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刊於《民主評論》〔香港〕)。
1967年3月	《大屋小車集》 (半壁書齋隨筆第二輯)	臺中：中央書局	4下	所收的隨筆在文末都未記載初版年月、初刊報紙雜誌之名。其中3篇各刊載於《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中華雜誌》、《出版月刊》。其他刊載於《彰銀資料》的可能性極高。
1971年9月	《臺灣民族運動史》 (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等著)	臺北：自立晚報社	1上、下	1970.4.1~1971.1.10 在《自立晚報》連載〈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撰述人」同前五人，計278回，約50萬字。手稿為〈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1970.3.1脫稿)，全集以葉榮鐘的名字收錄。
1977年8月	《美國見聞錄》	臺中：中央書局	4上	連載於《自立晚報》，一部分也發表於《彰銀資料》，相當於〈半壁書齋隨筆〉的第三輯。
1979年6月	《三友集》 (蘇薊雨、葉榮鐘、洪炎秋著)	臺中：中央書局	4下	《國語日報》、《彰銀資料》等。推測洪炎秋為編輯。
1985年8月	《臺灣人物群像》 (李南衡編)	臺北：帕米爾書店	2	再加上四篇於1995年再版，葉芸芸、李南衡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2000年8月	《葉榮鐘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冊)	臺中：晨星出版		葉芸芸、藍博洲主編
2000年8月	《葉榮鐘全集 2：臺灣人物群像》	臺中：晨星出版		葉芸芸主編
2000年8月	《葉榮鐘全集 3：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	臺中：晨星出版		葉芸芸、藍博洲主編
2000年12月	《葉榮鐘全集 4：半壁書齋隨筆》(上、下冊)	臺中：晨星出版		葉芸芸主編
2000年12月	《葉榮鐘全集 5：少奇吟草》	臺中：晨星出版		葉芸芸主編、林瑞明校訂。生前自己以〈少奇吟草〉為題整理詩稿。逝世後遺族將包含未整理的晚年詩稿加以編輯，於1979年刊行，分發知己友人。全集收錄、公刊時，收錄了因當時時局之故而未收錄的〈哀哀美麗島〉(1961年5月23日)和〈無題〉(1978年)。
2002年3月	《葉榮鐘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下冊)	臺中：晨星出版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
2002年3月	《葉榮鐘全集 7：早年文集》	臺中：晨星出版		葉芸芸、陳昭瑛主編
2002年3月	《葉榮鐘全集 8：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臺中、晨星出版		徐振國主編，原題《彰化銀行六十年史》。
2002年3月	《葉榮鐘全集 9：葉榮鐘年表》	臺中：晨星出版		葉光南、葉芸芸主編，也收錄給在美子女(葉光南、葉芸芸)的家書，復復觀、王詩琅、洪炎秋、黃得時、葉光南的追悼、回想文。

淵源的中央書局<sup>24</sup>以《半路出家集》刊行，也許是作為文學家的名聲開始稍稍為人所知，之後也被一般媒體《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出版月刊》、《中華雜誌》等邀稿，而這些文章和持續在《彰銀資料》寫作的隨筆，一起被收錄在第二本隨筆集《小屋大車集》之中。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的編著，就葉榮鐘與林獻堂的關係、在林獻堂身旁的葉榮鐘所扮演的角色與位置，以及同世代中出類拔萃的中文書寫能力，再以重視氣節、有所不為而且不愛多事的個性等因素看來，當時除了葉榮鐘之外，別無其他人選。<sup>25</sup>這些因素也可以推測是後來蔡培火（1898-1983）、吳三連（1894-1989）邀請葉榮鐘執筆《臺灣民族運動史》的原因。在蔡培火等人的眼中，戰後的葉榮鐘可以說是當年抗日右派人士「永遠的文膽」。

抗日運動右派「前輩」們對葉的這種角色期待，和葉本身的「述史」之志並不是完全重疊。但是無論如何，可以推測，曾經萌芽於〈暴風雨時期〉（後述）初期的「述史」之志，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的編著過程中，作為可能實現的意志復甦了。其後，葉在1967年6月7日寫給留學美國的長男葉光南的信中提到，「我決意寫《臺灣民族運動史》早在十餘年前就已下決心的」<sup>26</sup>可以作為佐證。

而「自傳」的部分。在上述的書寫活動重新展開後不久，1963年11月8日給長男的家書中，葉榮鐘提及：「我現在除每期為彰銀資料寫隨筆外，還自撰寫回憶錄，近日寫完一篇抗戰中的生活紀錄題為〈半壁書齋由來記〉」，記下了執筆「自傳」的意志和實際的進展。<sup>27</sup>從翌（1964）年8月31日同樣給長男的家書記述中可以得知，此一〈半壁書齋由來記〉經由臺中外省籍友人徐復觀（東海

<sup>24</sup> 1924年自明治大學畢業、遍遊朝鮮半島及北京、上海而歸臺的莊遂性，一方面積極地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文化演講會，1925年為了振興文化事業，在臺中設立了中央俱樂部。作為文化交流設施，兼設餐廳、宿舍的俱樂部和書店，是其經營的目標，但實際上實現的只有後者的角色，也就是中央書局。參見葉榮鐘，〈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收於葉榮鐘著、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群像》（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154-156。翻閱葉榮鐘「退休生涯」時期的日記可以得知，當時的經營者是張耀錡，該書局是葉榮鐘購買書籍的重要管道之一，同時也發揮了臺中知識分子頻繁進出的沙龍機能。

<sup>25</sup> 這一點在執筆《彰化銀行六十年史》時，可以說也是同樣。該書於2002更名出版，即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8：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

<sup>26</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頁102。

<sup>27</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頁86。

大學教授，1903-1982）的介紹，以〈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為題，刊載於徐復觀主導的香港《民主評論》。<sup>28</sup>

在同日的家書中，關於「自傳」，還記下了這樣的旨趣：

- (a) 已寫了出生到 18、19 歲左右之事；
- (b) 關於「光復前後」（1941-1946）寫了約 2 萬 5 千字，寄給丘念台（1894-1967）請他看是否有發表的可能；
- (c) 從 1920 到 1935 年的部分，今後非找出空閒時間來寫不可。

(b) 的部分，以〈臺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為題，刊載於《民主評論》1964 年 12 月號，生前便收入前述的《小屋大車集》之中。(a) 也確實寫完，在去世之後，以〈葉榮鐘先生回憶錄〉為題刊載於《文季》第 1 卷第 3 期（1983 年 9 月），再收錄於李南衡編輯的《臺灣人物群像》（1985）。(c) 似乎沒有被當作一篇獨立的文章來寫，但是 1920-1935 年正好是葉榮鐘追隨林獻堂參加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政治運動的時期。相當於(c)的部分，可以說是融合在關於林獻堂的回憶以及《臺灣民族運動史》的記述之中。<sup>29</sup> 這封信中沒有碰觸的，是關於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時期。

#### 四、「臺灣先賢印象記」

1964 年 7 月 14 日寄給長男的家書，敘述了葉榮鐘「述史」的三階段計畫。這是受到好友莊垂勝的長男林莊生的勸說敦促。他寫道：

<sup>28</sup> 葉榮鐘，〈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民主評論》（1964 年 1 月）。此篇文章後來收錄在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2：臺灣人物群像》，頁 405-425。

<sup>29</sup> 在進入 1980 年代後，對於《臺灣民族運動史》一書出現了這是葉榮鐘所留下關於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的「見證」這樣的評價（〈紀念葉榮鐘〉，《暖流》2: 1 [1982 年 7 月]，頁 42），而忠於原稿刊行的《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比起依據連載於《自立晚報》而刊行的通行本，寫明是著者實際見聞而記下的部分更為顯著。兩者的文本比較，請參見尹章義，〈捨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手的互動：手稿本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報刊本、單行本《臺灣民族運動史》的比較研究〉，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647-672。

莊生日昨來信勸我用錄音保存我的講演：關於臺灣政治解放運動的經過，云分十次錄音，每次一小時半，共要十五小時，寫一本《臺灣民族運動史》我本有此計劃，唯資料尚未集齊故未動手。而且在這以前擬先寫完一本《臺灣先賢印象記》，把過去民族運動之重要角色描寫一下。現在已寫就六、七人，再加六、七人便可成書。這書出後應趕寫我的自傳，現已寫成三分之一。這兩書完成後才可著手寫民族運動史。<sup>30</sup>

根據〈家書〉，第一階段是論述 1920 年代抗日民族運動重要人物的事蹟，這時已經寫完的「六、七人」，應該包括林獻堂、莊垂勝、高天成、羅萬俔等人；「再加六、七人」的範圍則不明，但直至葉辭世為止，刊行的文章中有林呈祿、蔡惠如、林幼春、蔣渭水、楊肇嘉、施家本等人，葉辭世後以未刊稿發表的則有關於賴和、丘念台、吳三連等人的記述。<sup>31</sup> 關於第二階段的「自傳」已經提及。「現已寫成三分之一」，應該是指前述所引的〈半壁書齋由來記〉。

然後，這些文章都寫完、刊行之後，才打算著手撰寫《臺灣民族運動史》。但是眾所周知，實際上葉榮鐘並沒有按照這樣的順序，「自傳」在形式上還未完成，第三階段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就已經先完稿刊行，而被認為第一階段的部分，以《臺灣人物群像》為題，在其辭世之後，由認為葉榮鐘想要述史以傳承經驗的戰後世代文化人（李南衡，1940-）集結出版。

但是，為什麼要書寫臺灣人的歷史？我們可以找到兩個記述。一是 1964 年 8 月 31 日給長男家書中的一節。

臺灣人因過去五十年間的歷史關係，一般人對於國文的力量較差，致受輕視而吃大虧。但我有自信，臺人之才能絕不弱於任何民族，若能努力從事定有可觀。余現在不以老朽自棄，而孳孳以寫作為念者，第一是欲留一點記錄性文字以供將來修史者之參考；另一點是不願被人歧視臺人為不學無術之土包子。<sup>32</sup>

<sup>30</sup> 〈家書〉（1964 年 7 月 14 日），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87。

<sup>31</sup> 皆收於葉榮鐘著、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群像》，頁 131-134、169-176、187-198。

<sup>32</sup> 〈家書〉（1964 年 8 月 31 日），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89。

留下紀錄以供將來參考，而且證明臺灣人擁有不遜於他人的文化能力，這兩個是「述史」的理由。關於前者，葉榮鐘在一年多之後寫給林莊生的信中（1965年12月23日），更留下這樣的一段話：

日本統制下的臺灣解放運動，從結果看來，沒有一件是成功。但對當時的民眾，尤其是知識階級喚起當仁不讓之精神，確實起了作用。如果人類的文化不以現實之成敗做準則，而以提昇的精神水準來衡量，那麼，當時的運動是有一定的歷史地位。孔子、基督、釋迦之努力，以今日之狀況看來顯然是失敗，但歷史不能無視這些先賢的精神。我對記錄當時爭取自由之過程，感到一種使命感，而願意從這個觀點去寫臺灣之民族運動史。<sup>33</sup>

再者，葉榮鐘在1964年寫的詩中，已很明確表達其傳承歷史記憶的使命感：

先賢幾輩已歸休。餘緒誰能繼末流。  
幽德闡揚後死責。勉揮秃筆寫從頭。<sup>34</sup>

何以寫作？在政治史上無法成為勝者的臺灣人，也有歷史、也有與時代為伍的拼鬥精神。致力於「述史」，正是為了非傳達這種精神不可。這也是面對廣大的臺灣社會全體，強烈地要求承認臺灣人的歷史與文化的對等。這正是希望康寧祥、黃煌雄等戰後世代繼承的意志，也是他向1970年代的公共空間發話的精神。

## 五、「臺灣政治運動史」

接下來討論前述三階段「述史」計劃的最終階段「臺灣政治運動史」。如同前述，與葉榮鐘本身的計劃相異，此一階段提前執行，是因為1920年代抗日運動右派的「前輩」們之間出現內部紛爭。1967年5月11日寄給長男葉光南的信中，有如下的一節：

<sup>33</sup> 原文為日文。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頁240-241。

<sup>34</sup> 〈索居滿興四續〉組詩其六，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5：少奇吟草》，頁229。感謝審查人之一提醒此詩的存在及其意義。

最近肇嘉伯出版《楊肇嘉回憶錄》，因內中對其養父批評太過火，又因吹牛吹得太離譜，致受各方面反感，……引起軒然大波。這是好名之累的實例。

因其回憶錄風波的影響，受蔡培火、吳三連兩先輩的慫恿寫《臺灣民族運動史》。現在正著手籌備、初步預定明年出書。<sup>35</sup>

如果閱讀 1967 年元旦重新開始的日記記述，可以得知葉榮鐘開始積極地閱讀歷史書籍。從元旦開始閱讀《四書讀本》，<sup>36</sup> 次日開始讀《歷史雜談》(上、下卷)，<sup>37</sup> 12 日讀完。10 日，之前訂購的井上清《日本歷史》(上、中、下卷)<sup>38</sup> 寄達，2 月 4 日讀完，從 3 月 19 日起開始抄錄要點，5 月 20 日結束。從 3 月至 4 月之間，看了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黎東方《細說元朝》及《細說民國》(兩者都是上、下卷)。與 1938 年的日記第一次寫下「述史」之志的時候相似，葉榮鐘本身已經開始正式暖身。這個時期，受王詩琅之託著手製作《臺灣青年》的總目錄(3 月 20 日開始)，投稿《臺灣風物》，這也可以說是助跑的一環。正在此時，《楊肇嘉回憶錄》(1967) 的事情發生了。

4 月 12 日葉榮鐘收到蔡培火來信。這「不出所料係為肇嘉氏回憶錄問題」。<sup>39</sup> 接著，25 日蔡為了商討此事催促葉前來臺北的快遞送達，葉榮鐘在 5 月 2 日於國賓大飯店，和蔡培火、吳三連共進午餐。<sup>40</sup> 由葉榮鐘執筆寫作《臺灣民族運動史》一事，在這個時候已大致抵定。同月 7 日的日記，記載了楊肇嘉之弟(楊天賦)在豐原召開記者會攻擊《楊肇嘉回憶錄》此事之新聞報導的同時，也記載了「《臺灣民族運動史》漸次構成腹稿」。然後，這之後的日記中，有對於此事已經由蔡培火取得陳逢源的同意(9 日)、以及由吳三連支付葉榮鐘寫作經費的提案(23 日)的記述。接下來，終於在 27 日記道，作為寫作的直接準備，開始製作年表。<sup>41</sup> 另

<sup>35</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101。

<sup>36</sup> 《四書讀本》有許多版本，葉榮鐘在這個時期所讀的是哪個版本，並不清楚。家族寄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中同樣也沒有該書書名。

<sup>37</sup> 應該是池島信平編，《歴史よもやま話：日本篇》(東京：文藝春秋社，1966)，上、下冊。

<sup>38</sup> 岩波新書，1963-1966 年刊行。葉榮鐘戰後所讀的日文書，按日記記載，除了到臺北時在三省堂書店等購買之外，大都經由居住東京郊外的女婿張東亮替他購買寄送。

<sup>39</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 293。

<sup>40</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 295、297。

<sup>41</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 298-303。



外，在9月，成功地得到了《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這一重要的參考資料。<sup>42</sup>

年表的草稿完成於10月3日。<sup>43</sup>但是，葉榮鐘並沒有立即著手寫作《臺灣民族運動史》，那是因為嫁至東京的長女之死。長女蓁蓁因撫育兩個小孩，再加上住家新建與搬遷的過度勞累，從6月以來一直臥病在床，7月之後發燒不退而入院，被診斷為心臟瓣膜症，併發肺炎，9月時雖一度好轉，卻在10月13日嚥下最後一口氣。<sup>44</sup>此際又時值在美國留學的長男正準備博士論文的資格考試，次女剛進入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就讀，葉榮鐘非支撐家人不可，而總是散漫的次男蔚南（1950年生）的求學意志也非留意不可。妻子悲嘆度日，即便心情姑且平復下來，但每當知己朋友前來安慰，傷痛又再度復燃，終日以淚洗面。自己的心情也必須整理。11月10日開始寫作長篇隨筆〈蓁兒最後的信〉，12月9日完成。<sup>45</sup>接獲長女病危通知的時期，葉榮鐘對家人宣布皈依基督教，反映出這個時候他的心境。<sup>46</sup>

11月11日動手進行已經謄寫好的「年表」的校訂作業（13日結束），新年過後終於開始動筆。1968年1月7日的日記裡寫下了「目錄」，15日的日記寫道完成第一章〈臺灣民族運動之濫觴〉之「臺灣同化會」部分的1千字。<sup>47</sup>追溯他寫給長男家書之後的經緯可知：3月27日的信中提到第一章已經脫稿，並已交給蔡培火和吳三連校閱，4月12日第二章「六三法撤廢運動」1萬5千字脫稿，下

<sup>42</sup> 9月21日在臺北與王詩琅一起拜訪黃得時而借得（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28）。之前，1967年5月向高日文借書，做了若干資料的抄寫等，但是似乎只借了約1個月左右（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00-309）。戰後臺灣知識分子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能夠保存、以及閱覽1920年代抗日運動史基本資料的《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書，是非常有興趣的後殖民文化現象之一。

<sup>43</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31。

<sup>44</sup> 葉榮鐘，〈蓁兒最後的信〉，收於蘇薊雨、葉榮鐘、洪炎秋，《三友集》（臺中：中央書局，1979），頁202-207。

<sup>45</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47。

<sup>46</sup> 葉榮鐘在戰前的1929-1930年之間，曾經參加過是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矢內原忠雄在自己家裡講授的聖書講義。那個時候他尚未入教。1967年8月長女病危的消息傳來時，葉閱讀了1930年歸臺之際矢內原贈送的內村鑑三所著的《求安錄》，希望得到神的庇佑的記述見於日記（8月27日，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23）。在9月14日的日記中，出現了晚餐後告訴家人他已信奉耶穌的記述（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27）。一週後赴臺北之際，也告訴了蔡培火（葉榮鐘，〈蓁兒最後的信〉，頁205）。

<sup>47</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354、356。

週交給蔡培火校閱（13日的書信），5月26日第三章脫稿（25日的書信）。接下來，翌（1969）年9月21日的信裡寫道第七章已經脫稿，完成第八章的三分之一。1970年元旦的信中，表示第九章也已完成，只剩下一章，並且預訂寫完草稿後重看，之後連載於《自立晚報》，等連載結束後將出版專書。這封信中雖然說想要在1月中脫稿，<sup>48</sup>但是實際上草稿的脫稿是3月11日。<sup>49</sup>

若製作「年表」是為了執筆所進行的直接準備作業，那麼他從1967年5月27日起到同年的11月13日，花了將近6個月。又假若製作「目錄」算是開始執筆，那麼真正的執筆階段，是從1968年1月7日到1970年3月11日為止，花費2年2個月。連同製作「年表」的時間，總共花費2年又8個月。這段期間，葉榮鐘夫妻雖然遭逢喪失長女之痛，但是長男葉光南在1965年與林妙芬結婚、1968年長子誕生，翌（1969）年取得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的化學博士學位，讓夫妻兩老頗感欣喜。1970年草稿完成之後，次女芸芸從實踐家政專科畢業，此時與東海大學助教陳文典開始交往，翌年結婚。1970年8月，次男蔚南考取世界新聞專科學校。<sup>50</sup>葉榮鐘雖然遭受長女亡故異鄉之痛，但在撰述自己代表作的同時，為人父的最終階段任務也正在一步步實現。

《自立晚報》的連載，原訂在3月20日開始，但實際上變成在4月1日刊出。<sup>51</sup>之後，於1971年1月10日結束連載，接著以《臺灣民族運動史》為題<sup>52</sup>出版專書。該書版權頁的刊行日期記為同年9月，但是根據日記，葉榮鐘拿到該書是在11月8日。<sup>53</sup>

<sup>48</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頁111。

<sup>49</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9：葉榮鐘年表》，頁112。

<sup>50</sup> 家人的動向是依照日記（《全集6：葉榮鐘日記》）與年表（《全集9：葉榮鐘年表》）的記述。

<sup>51</sup> 同日日記，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539。

<sup>52</sup> 但是在筆者手邊的「初版」版本，在所有偶數欄頁中記載的書名是《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

<sup>53</sup> 由葉榮鐘撰寫的「序」的原稿中，「序」的日期是「中華民國60年6月17日」（葉榮鐘，〈原序〉，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674），但是如同後述，最後經過蔡培火之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初版的「序」變成「中華民國60年6月□日」，日期是空白的。6月17日是1895年臺灣總督府開始正式在臺灣展開業務的日子，總督府將此作為「始政記念日」，但是1920年代在東京留學的一部分臺灣青年人將這個日子視為「恥政記念日」而加以抨擊。實際上的「序」的日期空白的原由不明，但這樣一來確實消去了葉榮鐘給「6月17日」附上的象徵性意義。

這樣，葉榮鐘「述史」之志的核心部分雖然完成，但是對葉榮鐘而言，也有違背本意、成為某種憤慨根源的事，原因出在蔡培火。第一，在《自立晚報》連載之際，由於蔡培火的主張，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五人被當作共同編輯，標題變更為〈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sup>54</sup> 第二，在專書中，標題雖然改回原來的名稱，但是在編著者方面，葉榮鐘的反對不被接受，結果還是由上述五人聯名為執筆者。<sup>55</sup> 第三，專書的「序」中，寫著五人共同收集資料、決定執筆方針，「葉榮鐘君撰寫初稿」，但是在葉榮鐘的原稿之中並無「初稿」二字，可知這是蔡培火未經葉榮鐘的同意而最後加上的。<sup>56</sup> 第四、刊載於《自立晚報》時，校閱的蔡培火和該報編輯大幅刪除、訂正和加註，變得「與本來面目大不相同」。<sup>57</sup>

關於第一、第二點，葉榮鐘雖壓抑不滿，最終卻仍接受了。其理由在 1971 年 2 月 2 日的家書中，對長男做了以下的敘述：

出書事因有種種顧慮不便破裂，第一是多年同志不忍到這麼大的年紀弄到不歡而散。第二是臺灣最慘就是不能團結，現在為此鬧翻恐要被人笑話。第三林柏壽是好人，他參加是出自善意的，一旦破裂深恐使他蒙受池魚之殃，是故自己委屈息事寧人為得策也。<sup>58</sup>

但是，第三點卻無法忍受。葉榮鐘向《自立晚報》提出抗議書的同時，也寫了要寄給蔡培火的「絕交書」。<sup>59</sup> 11 月 11 日執筆，反覆推敲，17 日給中央書局的張耀錡看，並在這一天定稿，送去打字。但是，20 日從打字行拿回原稿，結果並沒有寄出，因為妻子施纖纖並不贊成。<sup>60</sup> 根據葉芸芸的說法，施纖纖的勸阻如下：

<sup>54</sup> 〈家書〉(1970 年 3 月 28 日)，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113。

<sup>55</sup> 葉榮鐘的主張是「葉榮鐘著、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監修」(葉榮鐘「原序」，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1：日劇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674)，蔡培火提案由自立晚報以 4 萬元向葉榮鐘買下(著作權)的方式，但是遭到葉榮鐘拒絕。見給葉光南的〈家書〉(1971 年 1 月 15 日)，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117。

<sup>56</sup> 1971 年 11 月 8 日日記，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691。

<sup>57</sup> 〈家書〉(1971 年 1 月 15 日)，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117。

<sup>58</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118。

<sup>59</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674。

<sup>60</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693-694。

母親認為出版著作權一事之所以不能達成協議，不只是蔡培火一個人的堅持，吳三連的態度可能更為關鍵。而蔡、吳兩位皆為父親多年同志且是前輩，為著作權事而破裂，實在令人遺憾。因此她勸父親擱下此事，把精力投入新的寫作。<sup>61</sup>

戰前抗日運動時期的前、後輩這樣的人際關係，到戰後仍然留下影響，並且，一方是原行政院政務委員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蔡培火），以及原臺北市市長的自立晚報發行人、「臺南幫」的重要人物（吳三連），一方只不過是一介退休銀行員，存在著現實上的角力關係。葉榮鐘終究只有再度將滿腔憤恨吞入腹中。應該說妻子施纖纖比葉本人更清楚了解，丈夫在抗日運動的後殖民國人脈中被置放的角色，或者應該說作為葉的妻子，施纖纖只是將丈夫心知肚明的事情說破而已。夫妻兩人的選擇很可能是正確的。

## 六、「日記」與「國民黨統治下二十五年史」

1966年元旦，葉榮鐘在日記的開頭以日語這樣的寫著，不，他自己宣言從今以後要寫「日記」。

自從十幾歲的時候，我就感到有記日記之必要，事實上，也買了不少日記簿，但都不能繼續，中途而廢。自嘆缺乏恆心，因而時時抑制這個念頭。光復以來，特別是二·二八以後這十七、八年間，極力避免慾〔原誤：欲〕記日記之心願，因怕庸人自擾也。現在我年六六，已是老朽，沒有人注意。寫一些心中之不滿概也不會引起麻煩才對；因此，重綴這份日記。<sup>62</sup>

這裡所提到的日記並不是一般意味的日記，而是葉榮鐘獨自賦與意義的「日記」。如果是類似每天的備忘錄之類的話，在1966年以前他確實也寫著日記。翻閱葉的家人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珍藏資料」，

<sup>61</sup> 葉芸芸在2009年11月24日給筆者的電子郵件。

<sup>62</sup> 原文為日文。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269。

可以發現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的 1947 年到 1954 年的 8 年之間並未有日記，這段期間確實完全沒有寫日記，但是之後，雖有中斷，除了 1956 年（林獻堂逝世該年）及 1958 年 2-12 月之外，以商用手冊記下的筆記式日記一直持續到 1965 年為止。之後，1966 年只有包含上述引文的年初 3 天的日文日記，之後完全從缺。這一年葉榮鐘從彰化銀行退休，翌年的元旦起，除了 1977 年 6 月底到年末因癌症住院的期間之外，直到 1978 年癌症復發再度住院為止，從不間斷地寫日記，連 1974 年訪問美國、日本期間亦是如此。<sup>63</sup> 但這與 1965 年以前大致相同，基本上都僅是筆記式備忘錄程度的日記，承襲了 1965 年以前的形式。

因此，這裡所說的「日記」，指的不是葉榮鐘慣例形式的日記，而是包含「二·二八事件以來，十七、八年之間有意識地」的避免書寫，寫的話可能變成「庸人自擾的結果」的事情之記述。也就是，在這一年年初，葉榮鐘試圖挑戰以日語寫下能記述政治上敏感內容的新形式之「日記」。但是，並未能夠持續。1966 年元旦到 3 日為止的日記，也只是記下家人動向和家庭經濟狀況之類的筆記而已。為什麼馬上停止，也不得而知。

葉榮鐘曾經有過這樣的嘗試，顯示了他在前述「自傳」的計畫中未表明的二·二八事件後的同時代史，也保持執筆寫作的意志。1971 年 1 月 10 日日記的以下文字，可以確認這個意志：

近日頗思寫一本國民黨統治下的二十五年史。但茲事體大，一個人之力恐不勝任。<sup>64</sup>

這一天剛好是從前年 4 月 1 日起連載於《自立晚報》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連載結束的日子。這正是結束一件工作、思考下一步的時候，但前一年的臺灣光復二十五周年，似乎帶給葉榮鐘一種感慨。臺灣的歷史性紀念日、從而在政治上也成為敏感日期的日記，是不是有著某些相關的記述？翻檢「退休生涯」的日記，在 2 月 28 日、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始政紀念日）、8 月 15 日、9 月 3 日（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各個日記中，都沒有任何相關的記述。但是關

<sup>63</sup> 《葉榮鐘全集》將此作為「第二部：退休生涯（1966-1978）」，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之中。

<sup>64</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615。

於 10 月 25 日（光復節），在 1970 年突然出現了相關記述，在翌（1971）年也曾出現（其後皆無）。前者是〈昨夜臨睡作新體詩一首，十月二十五日感想〉：

但願這是一場惡夢  
一覺醒來月白風清  
無恥與殘虐隨風消失  
歧視與壓迫化於無形  
憤怒不再動我的心火  
醜惡不再污我的眼睛  
啊！二十五年的惡夢<sup>65</sup>

翌（1971）年同日，記的是〈晚成「十月二十五日」七絕一首〉：

年年此日最傷神，  
追悔空教白髮新；  
送虎迎狼緣底事，  
可堪再度作愚民。<sup>66</sup>

在公開的文章中當然使用「光復」一語，但是在日記的這兩項記述中，很明顯的有意避開使用「光復」一語。在 1945 年，顯然即將結束的日本殖民統治最後時日出生的次女，葉榮鐘將之幼名取為「光復」。<sup>67</sup>但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卻不得不感到 10 月 25 日是「年年此日最傷神」。他如何對待「二十五年的惡夢」之歲月呢？可以推測得知，對於葉來說，寫作「國民黨統治下的二十五年史」是其途徑之一。

翌（1972）年，葉榮鐘有一題為〈十月廿五日〉<sup>68</sup>的組詩：

<sup>65</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冊，頁 584。

<sup>66</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688。

<sup>67</sup> 葉榮鐘，〈臺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2：臺灣人物群像》，頁 432。另外，葉榮鐘詩作中如何（不）使用「光復」一詞的解釋，也值得參考。參見廖振富，〈論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之研究價值〉，頁 35-38。

<sup>68</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5：少奇吟草》，頁 239-240，但日記裡無記載。

〈其一〉

迎狼送虎一番新。  
浪說同胞骨肉親。  
軟騙強施雖有異。  
後先媲美是愚民。

〈其二〉

鑄成大錯豈無因。  
畢竟權宜誤我民。  
悔禍天心猶未晚。  
解鈴賴端繫鈴人。

回顧 1970 年代初期，1971 年光復節同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喪失了聯合國席位，接著 1972 年春天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發表了〈上海公報〉，臺灣的國際處境也頓形艱難。如果〈其二〉，特別是後半詩句，可以解釋為葉榮鐘反映此一國際變局而期待國民黨統治階層有所反省的話語，他對寫作「國民黨統治下的二十五年史」的意欲就不減反增也未可知。1973 年 11 月 15 日的日記中，他記述了想更進一步撰寫〈一段暴風雨時期之生活記錄〉續篇之想法。<sup>69</sup>

不過，歸根究柢，葉榮鐘想要在「臺灣民族運動史」之後，添加包括戰後自己所走過的時期的同時代史，其所剩時間不長了。結果，「國民黨統治下的二十五年史」和前述想用日文在日本出版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sup>70</sup> 同樣都未曾動筆。但是表明要寫下「國民黨統治下的二十五年史」的意志，顯示葉榮鐘「述史」之志的堅強。同時，這不僅止於要求承認「日本統治下」臺灣人的精神而已，還要求承認貫穿至「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人精神。

<sup>69</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878。

<sup>70</sup> 1971 年 3 月 24 日給葉光南的書信中敘述道：「我現在計劃用日文寫一本《日本統治下之臺灣》。前在自立晚報發表的《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係站在臺灣人的立場，寫臺灣反抗日本爭取民權的事實。現在計劃中的書擬換一個角度，寫日本的支配者如何虐待臺人，榨取臺人膏血的事實。不過日文光復後除通信以外幾乎沒有機會執筆，是否應付得來，不無疑問」（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9：葉榮鐘年表》，頁 119）。一年後在給林莊生的信（1972 年 3 月 25 日）中雖然提到，原稿完成的話會寄到東京，目標在岩波等書店出版（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頁 245），但是原稿並未執筆。

## 七、葉榮鐘與青年們：歷史記憶的傳承

葉榮鐘在執筆與出版《臺灣民族運動史》時的憤恨，只有自行吞飲，但即使如此，仍然完成了「述史」之志。而且，葉榮鐘的忍耐得到了回報。第一、書籍的銷售情況似乎不差。對左派抗日運動的相關記述非常地少，這一點或許會令以往的相關人物有所不滿，<sup>71</sup> 儘管如此，這樣的書籍在戒嚴時期著述出版，可以說本身就是一個「事件」。當時坊間這類書籍流傳的很少，或許也是頗有銷路的原因之一。書籍的具體販賣冊數並不清楚，但是《臺灣民族運動史》發行的當年就進行第二刷（第一版），著者逝世之後也持續順利地再版印刷。<sup>72</sup>

第二、隨著時間，從海外以及臺灣內部都有相當的迴響傳遞給葉榮鐘。當時，臺灣的國際情勢已告蒙上烏雲，戰後世代的自我主張，即蕭阿勤所說的「回歸現實」的思潮，也即將採取更明確的形態。地方選舉中保有命脈的「黨外」人士批判國民黨的聲音，不久也獲得「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這樣的新政治競爭空間，以訴求鮮明的民主化運動呈現出來。在這之中，可以說《臺灣民族運動史》已經悄悄地吸引了目光。海外的迴響，首先是來自在美臺灣人、在日臺灣人的部分，關於後者，與在日學者戴國輝所主持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發展動向也有所關聯。<sup>73</sup>

<sup>71</sup> 在《臺灣民族運動史》的「凡例」之「三」，提到「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係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領導。是故左翼的抗日運動與階級運動均不在敘述之列」。這是因為著作葉榮鐘和後援者兼校閱者的蔡培火、吳三連等人都是屬於抗日右派人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長期戒嚴令下執筆、出版的結果。即使與《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中所附尹章義整理的葉榮鐘原稿作一比較，大多數與左派相關的記述在公開時就被刪除。參見尹章義，〈捨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手的互動：手稿本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報刊本、單行本《臺灣民族運動史》的比較研究〉，頁 662-666。

<sup>72</sup> 1971 年最初以「自立晚報叢書」印刷的是「初版」，但是同年「一版」就被印出，1982 年「再版」、1983 年「三版」問世。在這期間，臺北的學海出版社出版了類似的海盜版。自立晚報的部分，從 1987 年的「四版」改為「本土系列 2-1」，增刷了「五版」。「初版」之後從印刷了「一版」起，實際上應該是印了「六刷」。之後似乎變更說法為增刷次數，1993 年出版的書籍以「一版七刷」記載。並且，如同上述，根據葉榮鐘當初的原稿改題為《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於 2000 年作為《全集 1》刊行。

<sup>73</sup> 從日本來的反應首先是池田敏雄（戰前《民俗臺灣》編輯者），大概是王詩琅的介紹，寄來了很長的書信（1972 年 1 月 12 日），內容可能是肯定《臺灣民族運動史》吧，那一天的日記記著「早上接東京池田敏雄一封長信使余一天興奮不已」（見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709）。之後戴國輝來訪（同年 8 月 13 日），再之後戴、池田等在東京所成立的臺灣史研究群的日本人碩、博士班學生一個接一個來訪，筆者也是其中一人（日記，1973 年 3 月 6 日）。之後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與葉榮鐘的交流，還需等待當時與葉榮鐘往來最多的臺灣文學史研究家河原功（當時日本成蹊大學研究生）的回憶發表，再度檢討。



在臺灣內部，不只得到身旁知己的好評，<sup>74</sup> 也獲得來自戰後世代的回應。從葉榮鐘日記的 1970 年代前半部分可以窺見，陳少廷、康寧祥、李南衡這些 1970 年代「回歸現實」思潮或黨外民主運動的中堅人物接近葉榮鐘，到了 1970 年代後半，比他們再年輕些的世代，也就是美麗島事件後臺灣史再解釋時期的作家，還有 1980 年代後半以後掀起臺灣研究、臺灣史研究熱潮的學者們的名字，也散見在他的日記裡。當時是大學生、研究所學生的他們，有的或是讀了《臺灣民族運動史》、或是可能讀了《臺灣政論》中刊載的臺灣人物論，而前來拜訪葉榮鐘。以下摘記葉日記相關部分，以便窺知他們與葉榮鐘互動的一二：

- \* 盧修一（1973 年 7 月 9 日）：下午三時半盧修一氏持黃得時兄介紹狀來見，請教有關臺灣民族運動諸問題，頭腦明晰儀表不俗語言亦伶俐，談約三個小時，六時餘歸去。<sup>75</sup>
- \* 林載爵（1975 年 1 月 3 日）：晚林載爵君導留德梁君〔按：合理的推測是梁景峰〕及《臺灣時報》李君訪。<sup>76</sup>
- \* 簡炯仁（1975 年 7 月 3 日）：上午十時餘到書局〔按：中央書局〕簡君已先在，乃帶他到經理室談約兩小時，他的論文題目是「抗日時期的臺灣知識階級」，簡君炯仁鳳山人中興大學畢業現在臺大政治研究所深造，關於臺灣民族運動之文獻似乎涉獵頗多。<sup>77</sup>
- \* 林瑞明（1977 年 1 月 5 日）：「三時許，林瑞明者持楊貴〔按：楊逵〕君名片來訪，稍後又有其同伴吳姓青年<sup>78</sup> 來會談移時，將近六時辭去。林

<sup>74</sup> 雖然不能稱作是「好評」，在 1972 年 2 月 11 日的日記中，記述了帶著青年前來自家訪問的作家吳濁流告知，也有人將書名解讀為「臺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720）。筆者也從與筆者同世代的臺灣友人口中曾經聽過，最初看到該書的書名時這樣解讀之語。此外，這雖然也算不上是「好評」的例子，但在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專藏文庫孫運璿」中有本書一冊，後來成為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孫運璿也似乎對本書有所關心。

<sup>75</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854。

<sup>76</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957。

<sup>77</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992。

<sup>78</sup> 這位「同伴吳姓青年」，根據林瑞明教授給筆者的電子郵件指出，「幾可斷定吳姓青年是常以計汽車載楊逵出入的調查局特務！當天，亦是尾隨我而來，想探知與葉榮鐘談些什麼。後來我警覺到了，提醒楊逵，才不再接受他載出載入」。葉榮鐘是否察知這件事，不得而知。與不是舊知見面會有這樣的政治風險，這無異是葉榮鐘這一世代的知識分子所感受到的身體感覺。這也是他的日記裡面言及其他政治關係，以及對新認識的年輕人的記述，只停留在非常簡單的程度的一個理由吧。

君借去日文書四冊及《三民主義》。<sup>79</sup>

\* 王世勛、吳乃德（1977年2月20日）：十時《臺灣時報》記者王世勛者偕吳生〔吳乃德〕如約來訪，他說受鍾肇政之託擬為國史館（聽說是秦孝儀主其事）撰寫《蔡惠如先生傳記》（至今年光復節將出版十人傳記），因他對日據時期的民族運動幾乎一無所知，所以請他先讀拙著《臺灣民族運動史》然後再來談。<sup>80</sup>

\* 張炎憲（1978年8月16日）：早上到順天醫院接受第二次注射。傍晚王詩琅君介紹張炎憲者來訪留飯。<sup>81</sup>

稍後《夏潮》主編蘇慶黎也前來拜訪葉榮鐘，並且邀稿（1976年8月8日），<sup>82</sup>根據葉芸芸的說法是由李南衡陪伴而來。這個時候開始，葉的健康不佳，和李南衡約定書寫賴和的文章也未能完成，沒有投稿《夏潮》。<sup>83</sup>

討論當時那些還是未來式學者、知識分子與葉榮鐘之間的交流，現在尚未有足夠的材料。正如上述，葉榮鐘日記對於來訪者，除了記下名字以外，並沒有著墨很多。這些來訪者，除了李南衡之外，也未發表回想文等。<sup>84</sup>因此，在這裡只能簡單檢討他與康寧祥——無論是在1970年代與葉榮鐘的互動上，或是重新思考抗日歷史的行動上，都是最突出的戰後世代人物——之間的交流。<sup>85</sup>

蕭阿勤以對康寧祥進行的口述訪問為基礎，認為康寧祥因為自身成長環境的關係，早在從事政治活動之前就與知悉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老世代臺灣知識分子」熟識交往，對他們的經驗談耳熟能詳的同時，也接觸了殖民地時期的歷史相關文獻。<sup>86</sup>這裡所提到的「老世代臺灣知識分子」，應舉之為首的就是王詩琅。康寧

<sup>79</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1132。

<sup>80</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1143。

<sup>81</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1198。

<sup>82</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1092。

<sup>83</sup>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頁343-344。

<sup>84</sup> 李南衡在〈葉榮鐘先生不原諒我〉回憶曾經兩度訪問葉榮鐘宅。參見李南衡，〈葉榮鐘先生不原諒我〉，《暖流》1:1（1983年7月），頁47-50。

<sup>85</sup> 葉榮鐘的日記當中，活躍於《大學雜誌》的陳少廷之名也常常出現。每一號的《大學雜誌》都由陳寄贈。陳是在1973年1月3日，由其妹夫施維堯陪同，前來訪問葉宅。這之後也有面會往來，其具體內容有再度檢討的必要。

<sup>86</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285。

祥在臺北市萬華的住宅就在王詩琅住宅的後方，他們是鄰居，輕易就能夠往來。

另一方面，根據葉榮鐘日記的記述，退休之後的晚年時期，葉榮鐘幾乎每個月一次前往臺北，那時常常和洪炎秋、黃得時、王詩琅、丁瑞魚（1901-1973）等住在臺北的友人們會面聊天。這些友人到中部時，也一定和葉榮鐘聯絡、碰面。他們在臺北喜歡去的餐廳是延平北路的西式餐廳「波麗路」，臺中通常都先在中央書局會合。葉和這些人的往來與蔡培火、吳三連、陳逢源等所謂抗日運動「前輩」的關係不同，完全是不須拘泥，知心友人同好的交遊。

康寧祥第一次出現在日記中是 1974 年 12 月 8 日。葉榮鐘因為妻子拔牙，從幾天前就待在臺北。<sup>87</sup> 這一天早上，王詩琅陪著康寧祥一起到宿舍拜訪，共進早餐。<sup>88</sup> 康寧祥和王詩琅有上述的鄰居關係，從王詩琅和葉榮鐘碰面的頻率來看，當時葉和康也許不是初次碰面。

在這之後一直到葉過世的日記中，他與康有 11 次在臺北以及臺中會面的紀錄。最後一次會面在 1978 年 5 月 5 日，康寧祥陪姚嘉文、王拓以及陳宏正（待查），拜訪葉在臺中的居處。<sup>89</sup> 除此之外，1976 年 11 月 28 日，8 名青年由康寧祥介紹前來拜訪。他們都是讀了葉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和其他文章，葉在日記中記下：「他們可以說是有心人也，近來年青人漸注意日本統治時期的事情，實屬可喜。」

康寧祥在 1975 年 3 月在立法院質詢，要求行政院長蔣經國尊重臺灣歷史。康從鄭成功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的事蹟開始，依照官方的中國國族主義模型，回顧了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占領之際的武裝抵抗之後，強調臺灣受到第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中國五四運動等影響，進行了「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抗日運動，臺灣同胞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所付出的犧牲以及受到的苦痛「就算不勝於，也絕不少於大陸同胞的八年抗戰之苦」，論述當時抗日人士「思慕祖國之

<sup>87</sup> 葉榮鐘與戰後世代、以及與同時代日本學界的關聯，無疑是王詩琅帶來契機的。兩人如何認識尚未確定，根據葉芸芸的說法（2009 年 11 月 24 日給筆者的電子郵件），兩人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已經認識，但是密切往來則是從王詩琅任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在地臺中）開始的（1961 年就任該組編輯組長。葉瓊霞，〈王詩琅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 99）。

<sup>88</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952。

<sup>89</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 1186。

志」正是抗日最大憑藉。且認為臺灣人民的抗日歷史也是「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貴重遺產」，要求將之寫入歷史教科書，應該讓本省人的學生知曉臺灣先人「思慕祖國與民族尊嚴」的事蹟。蔣經國對於「將臺灣、澎湖同胞的愛國事蹟編入教科書」，讓青年學生更進一步背負「反共復國的神聖任務」，以「非常贊成」回應。<sup>90</sup> 康寧祥的這個要求，不用說當然是以得自王詩琅、葉榮鐘等人的知識作為背景，繼承了他們的精神。

之後，1975年8月康寧祥等人創辦了《臺灣政論》（康是臺灣政論社社長、黃信介為發行人、張俊宏任總編輯）。如同前述，由於康寧祥的邀請，葉榮鐘在創刊號、第3期、第5期投寄了三篇文章。從日記的記述中，可以察知葉榮鐘對於這個戰後最早以本省人為中心編輯發行的政論期刊，其報導抗日運動史一事非常高興，並且這種雜誌能夠發行的這件事本身也讓他感到些許的興奮。雜誌每當發行，便由雜誌社郵寄送來，或者有時由康寧祥自己順道帶來，葉榮鐘也會從街上的書店或者報亭買來，借給友人推薦閱讀，或剪下其中希望閱讀的片段寄給在美國的子女。從張耀錡那兒聽到放在中央書局的50本（大概是第2期）在一天之內，賣到只剩下十幾本一事，還特地記在日記裡（1975年9月22日）。<sup>91</sup> 但是，轉瞬之間，《臺灣政論》在12月第5期就遭到發行禁止的處分。

隨後，臺灣的政治、思想情況經過1970年代末期內外交織的危機（中壢事件、對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等），為之一變。但是葉榮鐘已經無法得見其貌，於1978年11月2日與世長辭了。

## 八、代結論

以上所論，儘管不全然充分，但嘗試探索出葉榮鐘如何在戰後1960年代後半到1970年代，一步步實現1930年代心中萌芽的「述史」之志。

以此為基礎，將「如何」置換成「為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可能的吧。為什麼非戰後世代的葉榮鐘，在1970年代「回歸現實」的思潮中現身？直率地說，

<sup>90</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279-281；若林正文，《台灣の政治：中華民國台灣化の戦後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頁151。

<sup>91</sup>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全集6：葉榮鐘日記》，下冊，頁1008。

這是因為《臺灣民族運動史》受到注目。那麼，為什麼葉榮鐘會撰寫《臺灣民族運動史》？那是因為蔡培火、吳三連等人要反駁楊肇嘉回憶錄的記述。那麼，葉榮鐘又為什麼會被找來成為撰寫者呢？這是因為葉榮鐘曾經是抗日運動右派，也就是臺灣土著地主資產階級民族派的「文膽」之故。林獻堂逝世之後，他的「文膽」的「正式」角色，在數年之間都是編輯與製作幾位辭世前輩同志的哀悼文集。這些經過葉榮鐘之手的哀悼文集，包括前述的《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之外，還有《羅萬俾哀榮錄》、《肇老（楊肇嘉）哀榮錄》。其他收錄在李南衡所編的《臺灣人物群像》的數篇，自不待言也都是為了哀悼辭世的前輩與友人、留住其記憶的經營。

但無論如何，葉榮鐘本人的「述史」之志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的編纂，可以視為戰後堅定其「述史」之志的契機。葉榮鐘作為「文膽」的角色，和「述史」的經營是重疊的。因此如同前述，為了民族運動史的著者署名問題，葉榮鐘雖然曾經一度到了寫下與蔡培火絕交書的地步，但終究沒有採取與臺灣土著地主資產階級民族派的網絡決裂的行動。就葉榮鐘看來，或許是他必須守護住自己所參與的抗日民族運動史（右派）潮流的名譽吧。

最後，這是進入到 1980 年代的事。臺灣史研究專家吳密察教授當時是支援康寧祥編輯雜誌的青年學者之一，對於蔡培火逝世（1983 年 1 月 4 日）消息傳來後的情況，回憶如下：

當時康寧祥是少數對臺灣政治前輩有關心的人，他參加了這些人的追思會之後，經常就會打個電話給我：密察，又一個死了，你幫他寫一篇吧。我就這樣在黨外雜誌寫了幾篇「我流」的追悼文。<sup>92</sup>

抗日運動前輩逝世之後，撰寫相關的文章公諸於世以紀念他們，並傳承記憶的做法，與美麗島事件之後的「黨外復活」，同樣都被繼承在黨外雜誌之中，這也可以說是葉榮鐘在 1980 年代後半臺灣史研究興盛之前，所留下來的遺產之一。

<sup>92</sup> 2009 年 9 月 16 日吳密察給筆者的電子郵件。吳密察所寫的這類追悼文，有蔡培火、陳逢源、葉榮鐘的三篇（吳氏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給筆者的電子郵件）。與這種活動有關聯的當時年輕作者與編輯，並不是只有吳氏。筆者希望包括吳氏在內的這些人將來都會撰寫回憶文章。

## 引用書目

《暖流》編輯部

1982 〈紀念葉榮鐘〉，《暖流》2(1): 42。

凡夫（葉榮鐘）

1975 〈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3: 66-69。

1975 〈革命家蔣渭水〉，《臺灣政論》5: 76-79。

尹章義

2000 〈捨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手的互動：手稿本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報刊本、單行本《臺灣民族運動史》的比較研究〉，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葉榮鐘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 647-672。臺中：晨星出版社。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編著）

1992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編者。

李南衡

1983 〈葉榮鐘先生不原諒我〉，《暖流》1(1): 47-50。

林春蘭

2002 《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頁 202-255。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

林莊生

1992 《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洪炎秋

1979 〈悼念葉榮鐘先生〉，《臺灣文藝》62: 239-242。

洪銘水

2000 〈《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葉榮鐘全集 5：少奇吟草》，頁 39-72。臺中：晨星出版社。

若林正丈

2008 《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陳少廷

1971 〈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知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大學雜誌》43: 4-8。

陳茂源

1968 〈大森の家庭集会の頃〉，收於南原繁等編，《矢内原忠雄：信仰・學問・生涯》，頁 108-114。東京：岩波書店。

許雪姬

2006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1): 109-151。

葉芸芸

2000 〈編輯報告〉，收於，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葉榮鐘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冊，頁 9-14。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6 《餘生猶懷一寸心》。臺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 葉榮鐘
- 1964 〈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收於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葉榮鐘全集 2：臺灣人物群像》，頁 405-425。臺中：晨星出版社。
- 1975 〈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臺灣政論》1: 52-54。
- 1979 〈蔡兒最後的信〉，收於蘇薊雨、葉榮鐘、洪炎秋著，《三友集》，頁 185-216。臺中：中央書局。
- 1985 〈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收於葉榮鐘著、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群像》，頁 149-159。臺北：帕米爾書店。
- 葉榮鐘（著）、葉芸芸（總策劃）
- 2000 《葉榮鐘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冊。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0 《葉榮鐘全集 2：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0 《葉榮鐘全集 3：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0 《葉榮鐘全集 4：半壁書齋隨筆》。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0 《葉榮鐘全集 5：少奇吟草》。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2 《葉榮鐘全集 6：葉榮鐘日記》，上、下冊。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2 《葉榮鐘全集 7：早年文集》。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2 《葉榮鐘全集 8：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臺中：晨星出版社。
- 2002 《葉榮鐘全集 9：葉榮鐘年表》。臺中：晨星出版社。
- 葉瓊霞
- 1991 〈王詩琅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振富
- 2004 〈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國文學誌》8: 35-76。
- 2006 〈論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之研究價值〉，《臺灣文學學報》9: 13-43。
- 2007 〈論葉榮鐘六〇年代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苦悶與蛻變：六〇、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與社會》，頁 611-664。臺北：文津出版社。
- 蕭阿勤
- 2008 《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Determination to Write History for the Taiwanese: Writing Activities of Ye Jung-chong in His Later Years**

Masahiro Wakabayash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life of Ye Jung-chong as an anti-Japanese intellectual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Before World War II, Ye Jung-chong was a right-wing intellectual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Such had been his image in modern Taiwan. After the war,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works in the 1960s when Taiwan was still under martial law, thereby passing down his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the 1920s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his life experiences that changed Ye Jung-chong from an anti-Japanese intellectual into a writer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lthough not belonging to the postwar generation, Ye Jung-chong attracted much the attention of the postwar generation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because of his book,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Movement*, and because he was part of the “back-to-reality” trend of thought of the 1970s. Although he was invited to write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Movement* as a refutation of Yang Chao-chia's memoirs, it did reveal his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write history.”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his role as a “writer” overlapped with his engagement to “write history.” Ye Jung-chong's zeal to write history stemmed from his demand for equal recognition of the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His spirit of recording history had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postwar generation, including Kang Ning-hsiang, Huang Huang-hsiung and others. Moreover, every time a predecessor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died, Ye Jung-chong published essays of commemoration and passed down memories of the forerunners. The *tangwai* magazines inherited his literary style, which was also a part of his legacy prior to the study of Taiwanese history 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1980s. Analyzing the writing activities of Ye Jung-chong in his late years can shed light on the post-colonial cultural movement and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ere discoursed, which makes it a part of social memory under the KMT's dominant, one-party regime in the postwar era.

**Keywords:** Ye Jung-chong,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Movement*, “Determination to Write History for the Taiwanese”, Kang Ning-hsiang